

考古好玩

高蒙河 著

【考古就是挖宝 考古不是挖宝】



复旦大学出版社

考古好玩

高蒙河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考古好玩/高蒙河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8
ISBN 978-7-309-08269-2

I. 考… II. 高… III. 考古学-通俗读物 IV. K8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8295 号

考古好玩

高蒙河 著

责任编辑/史立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7.5 字数 254 千

201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 000

ISBN 978-7-309-08269-2/K·340

定价: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考古好玩，善哉斯言！

考古有三个搞法：学考古，做考古，玩考古。

学考古和做考古，带有职业取向，行业性明显。考古学人和考古学家做得，考古玩家做不得，做不来，也未必想做。

玩考古，就不一样了。因为它不需要做精专的学问，不需要非说专业人士才听得懂的行话，不需要非得在这个行业里谋生，不需要恪守每条行规。一句话，学人做得，专家做得，百姓也能掺和。

老话说，不掺和白不掺和，掺和了不白掺和。曹操墓，就是大家都掺和过，都玩过考古的一个典型案例。因为不管你承不承认，只要你听说过曹操墓，你有过曹操墓是真是假的疑问，你拿曹操墓当过谈资，你公开或半公开发表过言论甚或表明过立场等，这要我看，就都算掺和过了考古，玩过了考古，做过了一回公众考古人。

可见，公众考古就是人人都能掺和的考古，而不是少数专家才有唯一解释权的考古；就是专家说的不一定是对的，公众想的不一定是错的考古。你像专家说“考古不是挖宝”，对不？你像公众说“考古就是挖宝”，错不？都很难三言两语掰扯清楚。凡事，说不清楚，挺好玩；说清楚了，也挺好玩。因此，考古好玩。

我出这书，就挺好玩。说来话长，长话短说。

我是学考古的，从1978年入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起，历时10年，1988年从张忠培先生门内硕士毕业。毕业后又差不多做了20年考古，从三峡做到南水北调，直至前两年日渐垂老，这才金盆洗手，挂铲收尘，不再怎么做一线田野考古了。在这30多年学考古和做考古之中，我还一点点地做起了“出轨”的事，那就是给非专业的报刊写点考古杂文或知识小品文。现在手头上能找到的较早的一篇，是发表在《新民晚报》1989年8月17日的《话说铜敦》。

印象中写《话说铜敦》，是有一天听电台广播，讲湖北有家博物馆的一件铜敦被盗，运到了美国，后来又如何追缴回来的事。但播音员功课没做足，把铜敦这种东



周古器的“敦”字，发音成了“dūn”，而文物考古的专业读法应该读“duì”。于是我给报社投稿，既讲了什么是铜敦，又纠正了读音。没想到还真有同事和家邻看到，叫我以后多写点，他们喜欢看云云。换句话说，上个世纪80年代末，是我溜出考古三界外，写点闲文野篇之始，也可以算是玩考古之始。

我大量给报刊写趣味性和知识性的考古小品文，是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新民晚报》为例，有时兴致来了，每个月都给该报的“夜光杯”等栏目写去一两篇发表，像什么《盗墓贼与洛阳铲》、《陶器鉴定五要素》、《司母戊鼎的新重量》等。那时还结合在三峡考古，忙里偷闲，写过《罕见石范出三峡》、《南方甲骨》之类。有时一忙没空写了，编辑会来催，说有读者反映，最近怎么没登高老师的文章，我们想看呢！也不知是真是假。但这使我晓得了原来社会和读者还真有这种需求，大家对文物考古还是有不无兴趣的。而我写作的体会是，把专业语言转换成公众能接受的“豆腐块”文字的难度，原来并不亚于写一篇专业学术论文。写学术文章，可以直接入题，高举高打，高谈阔论，不吝笔墨，引经据典，罗列数据，出示图表等。但真的要把这类学术语言、专业范式鼓捣成考古圈外的人都明白，让初中水平的人也都能看懂，做到忠培师所说的“提高基础上的普及”，深入浅出，实在不易。普及文章，看着好懂，动起笔来，既要铺垫，又不能像裹脚布那么长，还要兼顾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故事性等，都是愁煞人的事。

到了本世纪前后，中国考古界出现了一个学术进程性的转机，那就是长久以来一成不变的文物观开始发生变化，从原来只关心专业化的考古发现和研究，逐步扩大为社会化的保护和利用，甚至有了传承一说。虽然不能简单地把这些变化归结为重建考古价值，更不能看作解构考古传统，但考古的模式多元化了，考古人的做法也多样化起来，却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也从学考古，做考古，愈加觉得考古好玩，想玩好考古了。于是，也就不满足于只写考古知识小品文，转而写起带有故事性以及评论性的考古随笔来。不尴不尬的是，这些随笔有的写得太长，不太符合报纸那种千字文的要求；有的又写得半专业半不专业的，投出去发表也没个地界。趁着博客兴起，我把它们陆续堆积到我在网上开设的“公众考古试验田”博客上去了。这一堆就是几年，被推荐到网站首页或头条的有几十篇，总点击量已有约200万人次，有时写得好玩了，一篇的点击量就能超过10万人次。这样一来，编辑们找我要稿子的也多起来，有的报刊甚至直接从我博客上转发的也不在少数。去年下半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史立丽女士找我做选题，于是就有了把博文集合起来，出这本《考古好玩》的想法。但她也向我提出了要求：“一旦成书的话，最好能够‘出于博文，高于博文’，也就是说，不必完全照博客来，要多作些删并、填补，博文的痕迹也

要适当控制一下。”我觉得她说得非常有条理，于是就按照她说的办。草稿成文后，又让我在复旦带过的学生王太一作了一通全书的校勘和修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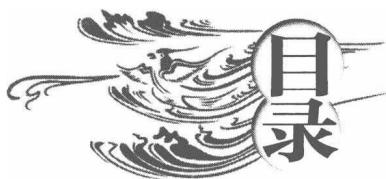
我不是考古界最早开博设坛的主，但我与考古界其他几位开博的考古人不同，他们开的多是学术博客，面向的是小众和精英，属于学院派；我开的是文化博客，也就是玩考古的博客，对象是大众凡人。恩格斯曾经说过，任何人在自己的专业之外都只能是半通。因此，我选题和叙事就尽可能做到以下原则：一不上传专业论文；二是少讲道理，多讲故事，当说书的，不当教书的；三是不罗列媒介报道的那种又有什么新发现了的考古结果，多讲述考古是怎么发现的一个个幕后故事，轻结果，重过程；四是放下身段，能唠白话就不端术语，尽量以初中或高中程度的读者为写作对象，因为这是中国最大的群体，考古为他们服务，引发他们互动，大家能一起做点什么，挺值！

所以，这本《考古好玩》在很多考古人士看来不过是初写作、浅解读而已，但却是我这些年力求把专业语言转换成公众语言，把专业知识转换为社会文化常识，把考古学扩大到公众考古领域，把考古人的学术生态扩增为知识分子本应肩负的社会公共职责的一个缩影。

心有所系，践行斯言：玩好考古，考古好玩。

高 蒙 河

2011年5月31日于上海虹桥



自序

一、考古人

郭沫若是不是考古学家	002
考古人是最基层知识分子	008
苏秉琦的得意之作	015
听张忠培讲那考古的事情	021
两张老照片 三代考古人	029
我学考古为哪般	035
女人考古好榜样	041
考古不藏古	050
考古人会不会鉴宝	055

二、考古队

考古工地干起来	062
考古队旗飘起来	070
考古队服穿起来	077
考古饭碗端起来	083
考古大酒喝起来	090
考古陋室住起来	095
考古厕所用起来	101
考古洗澡说起来	108
考古小道走起来	112

三、考古就是挖宝

考古发现哪里有	118
沙发考古与实验室考古	124

我投了曹操墓一票	131
考古发现谁更牛	138
哪位古人遗存多	143
中国有五千年历史、五千年文化还是 五千年文明	147
恐龙不关考古事	153
考古下限是何时	157
别老张罗挖帝王陵墓	161
回埋挖出的古墓是何道理	165

四、考古不是挖宝

野蛮考古何时了	170
兵马俑的叫法不太靠谱	176
碳-14 技术不是万能法器	180
有多少古墓没有墓门	183
古墓防腐有哪些招数	187
古墓防盗秘笈	191
盗墓贼不是啥都盗	203
我们处在薄葬时代还是厚葬时代	208
考古奖项谁来评	214
考古经费哪里来	218

五、考古好玩

我们看到的故宫是哪个年头的	222
翠玉白菜真那么好看吗	229
圆明园流失文物能不能花钱买回来	234
张艺谋奥运会开幕式之缶非缶	238
花 23 亿造地震博物馆荒唐不荒唐	241
中国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真难看	244
中国达人秀与英国考古奖	251
马未都与余秋雨谈考古	256
考古报道雷人记	261
考古当读什么书	265

一
考
古
人



郭沫若是不是考古学家

郭沫若是近现代名人，这从他的各种头衔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些头衔收录在《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等权威典籍中。能将姓名作为词条载入权威典籍，这可不是靠月薪过日子的平头百姓能有的待遇，也不是只会两把刷子的舞文弄墨者可求的尊阶。

《辞海》里的词条是怎么写郭沫若的呢？是这么写的：中国现代杰出的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但《辞海》的这个写法，在专业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里却又整成了这般说辞：“中国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仅此三项，再多，就没了，用词吝啬得像电报。

明眼人可能早已看出，这两本大书的说法不太一样。作为“社会权威”的《辞海》，明确说郭沫若是考古学家，而业内的学术权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却没说他是考古学家，起码没有明说他一定就是考古学家，这就叫人有点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了。可见，郭沫若究竟是不是考古学家，有的说是，有的两说着，既不说 YES，也不说 NO。《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这本大书是以考古学为书名并且是专写考古学的，收录了郭沫若作词条，却又不说郭沫若为考古学家，更叫人倍感蹊跷，不得定数。

但郭沫若在普通社会民众的认知里，却是赫赫有名的考古学家。记得我1978年考取吉林大学读了考古专业后，经常有行外的人听到我是学考古的，就告诉我说，那你们的祖师爷可是郭沫若啊！足见在公众的话语里，郭沫若不但是考古学家，还是考古学家的祖师爷呢。

那么，考古方面的专业人士又持什么样的看法呢？我找到了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夏鼐在郭沫若逝世后写过的一

篇纪念文章，那文章发表在专业杂志《考古》上，里边有这么一段话：“郭老虽不是一位田野考古工作者，但是由于重视田野考古工作，对这工作也感到兴趣。”我还翻到了曾创建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后来也曾担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的苏秉琦在《如何使考古成为人民的事业》一文里说过的话：“亲自参加，或至少熟悉田野工作，早已成为考古工作者的一个必要条件了。”夏鼐和苏秉琦是公认的考古大家、学界翘楚、新中国考古学的开创者和引领人，由他们从考古专业的角度来评述，该算够权威了，即便作为盖棺定论，也不过分，那就是：郭沫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学家，起码不是以田野考古为职业的考古学家。

所谓田野考古这种工作，在考古界内的重要地位，可用“定尺”、“天条”来比喻。换句话说，这也是考古学之所以有别于古物学或金石学而成为一门近代科学的关键之一。众所周知，在考古学作为近代科学诞生以前，国外早就有了古物学，中国可能更早些，至少在宋代就有了收藏和著录古物的金石学，也就是专挑有文字铸刻的那些铜器和石刻来把玩和鉴赏，以实现“证经补史”的目的。至于国外的古物学，远的不说，18世纪拿破仑远征埃及时，就带着研究埃及的学者同行，在埃及寻访古迹和古物。他甚至还劫掠过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古物，作为战利品带回法国，建立博物馆。拿破仑曾经有句名言传世，那就是“让学者和驴子走在中间”。在他的远征中对学者和驴子都格外保护，因为学者中有博物学家，能认识古迹和古物，而驴子不但能驮去成百箱的武器和辎重，还可以把劫掠到的珍贵文物带回法国。对这类也是在野外所做的各种调查和挖掘，我们既不能承认拿破仑带领的博物学者是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学家，更不能贴标签式地认定拿破仑就是考古学的领导者。否则，那笑话就闹大了。

再看中国，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曾有过三次文物大发现：一次是1899年，比较流行的一说是，相当于今天教育部最高官员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在一味叫做龙骨的中药材上发现了刻在上面的文字；一次是1900年敦煌道士王圆篆发现“藏经洞”，洞内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4万多件，后来遭到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一批又一批外国人乃至中国不少官吏的劫掠；还有一次是在1901年前后开始的被王国维称之为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最大发现之一的



“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即著名的敦煌汉简、居延汉简以及楼兰、尼雅等地发现的汉简。以上这些轰动世界的文物发现，都离不开野外作业，但如果哪位说这些就是考古发现，进而推演这些人都可在考古学家之百年殿堂上荣列一个牌位了，恐怕稍有点考古常识的人都不会答应。何况，中国的考古学是从国外引进的，一般业界认可的标志，是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对河南渑池县仰韶村的正式考古发掘。换言之，这些带有劫掠、探险、寻宝目的的行为以及取得资料的手法，最多只能说是文物发现而已，都不能和后来考古学的研究目标与科学方法相提并论。

文物发现与考古发现的性质不同，方法有别，目的迥异，喜欢考古和以考古为职业也是两码事，不能随便放在一个锅里煮。这要展开来说，起码涉及两步解法。

第一步，是看平时的工作是不是多在野外，说白了也就是是不是以发现遗存为主要职业目标。活忙的时候，一年到头在城里呆不了几天，虽不至于像大禹治水“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但到了年根儿底下才回家，过了正月十五又下了工地，都是常事，都是常态。像我有大学同窗叫魏坚的，据说常年都是在内蒙古的考古工地上，一干就是300天朝上，而且还兴致勃勃，乐此不疲，来劲得很。我虽然不知道他这种“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考古汉子在考古中是如何度过每一天的，倒是真佩服他太太是怎么拉扯孩子而又保留他户籍的。开句玩笑话，像他这种人早就该被起诉，判他个考古犯，每年在家关押3个月再放出来，才算对得起家人。考古连年累月，就意味着背井离家。不知何时起，这首顺口溜就在考古圈子里流传着：“嫁人不嫁考古郎，一年四季守空房，有朝一日回家来，带回一堆臭衣裳。”一届传一届，一辈传一辈，离校时，好涂鸦的毕业生就信手把它题在寝室墙上。家人们也经常把它调侃式地写进两地书，你像有位考古太太就曾揶揄自己丈夫的职业道：“远看像挖土的，近看是挖墓的，原来是考古的。”考古是与家人别离，却又和古人相聚的活计。吉林大学有一位年轻的考古老师叫方启，他不无感慨地透露过些许类似的感触。他说，考古人“最难受的是对家人的愧疚——笔者结婚1个月就出差田野调查，媳妇每次打电话都说挺好挺好的，突然有一天就放声大哭。她笑言：嫁一个考古人就要学会坚强。这样的经历在考古圈

中是家常便饭”。

第二步,就是看你会不会挖。所谓会不会挖,就是能不能按照考古行业的操作规程要求来把工地做好。做好的标准,不是看你挖到了什么,要紧的是看你怎么挖的,挖得科学不科学,专业不专业,行家不行家。有一次,全国召开各地考古成果汇报会,某个省的老兄一个劲儿地介绍他们挖了多少多少墓葬,墓里出土了什么什么器物、有多么多么珍贵。但见他兴高采烈拉着粘纸单子,全然像个收租回来的报账先生。只听得主持会议的夏鼐干脆叫停,批评道:这又不是献宝大会,你还是讲讲你们是怎么发现这些遗存的吧,发掘时遇到过什么问题,又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见,考古发现了什么并不重要,怎么发现的才尤其重要,知道了这一点极其重要,不知道这一点非常糟糕。用前故宫博物院院长、现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的话说,就是看在同样的面积或空间里,谁能挖到可供复原历史的信息最多。而不是只拣选完整的器物,不要残片;也不是虽拣残片,但不要人骨;更不是也拣人骨,但不要动物残骸等。一句话,凡是对复原古代人类生活及其生存环境有用的都要收集,都不能丢弃,“弃骨取器”,行业大忌。否则,一通乱刨,只顾挖宝,专拣值钱的玩意掏,那就是破坏,那就是比盗墓贼还坏。我有个搞博物馆陈列设计的朋友,常常讽刺我:“你们考古的,除了会挖,还会干什么?”他这话叫我郁闷,却道出了一个真谛,那就是:会挖,才是考古人的看家本事。

根据会不会挖和在野外考古的时长来定性一个人是不是考古学家,这在业内来说,是衡量一个考古学家基本功的起码标准,虽说有点过分,甚至过于机械,但却也无甚不妥。以这个话头,再来看郭沫若是不是能搞掂这两项野外考古学家标准呢?我检索了一下郭沫若大事年表,见有关他去野外考古工地的记录主要有3次:一次是1940年抗日战争期间,他在重庆嘉陵江北岸发掘过延光四年汉墓。但我记得看过一篇有关他这次考古经历的纪念文章,具体哪本杂志叫不上来了,好像只有一天半日地考察过或调查过;一次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他主张挖北京明十三陵中的定陵,好像不止一次到过现场,但多是看看为主,原则上没动手;一次是1968年他组织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专家发掘河北满城汉墓,他也到过现场,还指点过迷津,确定过方位,使考古队员们找到了另外一座刘胜之妻“窦绾”的墓,发现了著名的“长信宫灯”等鎏金铜器。



◎ 1959 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参观定陵地下宫殿

如此等等，梳理再三，郭老一生到考古野外第一线工地的 3 次主要经历，已经一目了然：时间都很短，与其说是考察，还莫如说是视察，实际上也就是去看看那些挖出来的文物，作些点评和指示，而不是亲自动手从事发掘文物和整理文物这两个最基本的考古工作。如果只用这样两个标准来评定郭沫若是不是考古学家，说他不是，也无可厚非。

要说发掘文物和整理文物，行家都知道，这是考古上的三个工作流程的之一和之二，还有一个流程，那就是对挖掘出来和整理出来的文物进行研究，这就是说考古学家不能只是“做”而不述。换言之，光会挖，常年在野外，那考古学家又与考古

技工何异呢？那不成了考古匠了吗？所以，考古学家不但得会挖，还得会思考，能研究，得有本事把挖到的东西说出个子丑寅卯来，研究出点条条道道来。这就是张忠培所说的考古学不但要有发现创新的本事，还要有研究创新的能耐。

说到研究出点条条道道来，那就是郭沫若的强项了。郭沫若的那些大作，比如他上个世纪 30 年代所作的《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殷契粹编》、《卜辞通纂》等，再如上个世纪 70 年代他主编的《甲骨文合集》，都是堪称领风气之先的甲骨、金文巨著，定鼎传世，无人能及。这些虽然不都是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学专著，可我一直觉得它们堪称金石学自宋代以来的巅峰之作。除了能研究，郭沫若对中国考古事业的关心和领导，更能名垂考古史。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他提议恢复因“文革”而停刊的《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三大考古学权威刊物，并经周恩来批准同意施行，成为“文革”后最早复刊的学术刊物。

可见，郭沫若能做的事情，考古学家未见得做得来，考古学家能做的事情，郭沫若也不一定干得了。照这么说，郭沫若到底是不是考古学家？还真的难解。这就像世上的许多事情一样，难解才需辩解，无解也是正解。

【相关链接】

郭沫若是著名的“甲骨四堂”之一。“甲骨四堂”源自复旦大学教授陈子展评价早期甲骨学家时写下“甲骨四堂，郭董罗王”的名句，这一概括已为学界所广泛接受，指对早期甲骨学作出开创性重大贡献的4位学者，因为他们的名号中恰好都包含了“堂”字，故称。他们分别是：郭沫若，字鼎堂；王国维，号观堂或礼堂；罗振玉，号雪堂；董作宾，字彦堂或雁堂。

唐兰曾评价他们的殷墟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

也有学者如许倬云认为“四堂”各有所长：“罗雪堂是收集东西，认若干字，了不起；王观堂了不起，一点小线索能写一大篇文章来；郭鼎堂是在日本拿马克思主义来套出一个构架，这个构架在今天看来是不对的；董彦堂是真正掌握实际发掘出来的东西，而且从中理出一个线索，可以驾驭这批材料，重建古史的功劳很大。”

考古人是最基层知识分子

我经常对复旦大学选修考古课的学生们讲，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能与社会基层的农民兄弟直接打交道的，大概也就有三类人：一类人是医生，一类人是老师，还有一类人就是考古学家了。

有的看官一定不同意我的说法，会列举出农学家、植物学家、水产养殖专家、地质学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房屋设计者、电视电话煤气管道村村通的技术人员等来 PK 我，甚至还会抬出水稻之父袁隆平大佬来反驳我，说人家不也是一天到晚挽着裤腿子在农村摸爬滚打吗？这么说，就把我的意思理解拧巴了。

因为袁隆平院士培植水稻可以在农科院的试验田里完成，未必直接与农民兄弟打交道。退一步说，即便推广水稻良种时，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县乡领导们号令乡镇，需要农技站里的技术人员们鼎力帮衬，此类领导或农业专家也是给农民兄弟带来福祉的。这就像医生为农民兄弟号脉打针，开方送药，干的都是祛病消灾的好事；就像地质学家找到了矿藏，不但能为当地脱贫致富做贡献，还能解决当地人的不少就业问题。所以，农学家们增产增收也好，乡村医生治病救人、老师教书育人也罢，乃至地质学家找矿惠民，做的都是积福积德、天地良心的大好事，农民兄弟们感谢你还来不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自然也就融洽至极了。

可考古学家与农民兄弟打交道时的处境，就不可与上述医生、老师、农学家、地质学家乃至那一串什么什么家的同日而语了。考古学做什么？虽不说是来挖人家祖坟的，却不免要在人家的地面上挖地三尺，刨人家的自留地，毁人家的经济林，这给农民兄弟带来的是明显的经济损失，殃及农民兄弟的切身利益，就难免发生直接冲突。本来嘛，考古学家下乡来之前，人家农民兄弟种地

种得好好的，消消停停地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你考古的来了，还要住人家房子，用人家的家具，上人家的厕所，雇人家当民工出劳力，这都会搅乱人家原本平静悠闲的生活方式。双方关系自打交道伊始，眼前凸显的就都是矛盾关系，想回避也回避不了。如此，农民兄弟给考古学家的，往往是笑脸不多，怒目不少。

所以，说考古学家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基层的知识分子，一点都不过分。甚至在某种情况下，考古人与农民兄弟们也没什么不同。像傅斯年 1928 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成立的时候说过一句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挖东西。”我看不少考古人往往把它演绎为“脸朝黄土背朝天，动手动脚找东西”。如果这种略带点自嘲的“篡改”不算太出格，那考古人和农民兄弟的劳作方式也就只有一字之差，农民兄弟不过是“脸朝黄土背朝天，动手动脚种东西”而已。换言之，既然考古人和农民兄弟的劳作方式，两样性不大，最好学会入乡随俗，别再端着个“考古学家”的架子，居高临下，颐指气使，指哪打哪，瞅哪挖哪。俗话说，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身在矮檐下，何处不低头？说的就是这个硬道理。曾是北大考古专业出身，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张承志就说过，考古人与民众之间有一种特殊的血肉关系：“中国考古队员工作时难以想象的劳累和底层化，成全了从这个领域中培养出这种人的可能性。”所以在那么多的学科专业里，考古学家可能是知识分子中最会与农民兄弟打交道的一伙人，早就练就了一身过硬的行政协调能力。

和农民兄弟讲大道理，说这是为了国家抢救历史文化遗产，你们要舍小家、顾大家，要为国家做贡献云云，行不行呢？行的，但要看你怎么讲了。直接讲，我试过，门儿也没有。我曾经在一户农民兄弟的菜地里钻探，发现了东汉时期的两座大墓，那叫兴奋，可地的主人就是不让挖。为什么不让挖呢？因为这菜还有一个月就能长成卖钱了，人家辛辛苦苦侍弄三个月小半年，你跑来讲这个大墓如何如何重要，怎么怎么有学术价值，说挖就给挖了，那怎么成？菜是我家种，地是我家租，管你什么学术不学术？

怎么办呢？我就去搬村干部。村干部要我们按总产量和市场行情做赔偿。可人家地主还是不干，说考古队挖得深，把地表利于种植的熟土挖没了，生土翻上来，来年庄稼会减产，你得赔两季的产量。可是上面给我的赔偿经费里哪有